

当代海湾国家的外来劳工移民及其影响

刘 军

2005年2月14—18日,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七次欧洲地区会议上指出:对劳工移民的需求正在日益增长,无论是高素质的信息技术和专业领域,还是低技术、低工资的农业、家政、建筑、医疗服务、保洁与维护等领域。对于海湾国家数目庞大的劳工移民群体,国内学界鲜有涉及。但是,根据联合国《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4),按劳工移民占所在国家总人口的比例,居全球前两位的国家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简称阿联酋)和科威特,居全球第六、第九位的阿曼和沙特阿拉伯也是海湾国家。

一、海湾国家外来劳工移民的概况

(一)历史

海湾国家拥有大量的外来劳工移民。然而,这些国家大规模吸纳劳工移民的历史相当短暂,并且与石油工业在这些国家的兴起基本上是同步的。海湾国家早期的劳工移民始于伊斯兰教传播时期,其规模较小,在类别上属于季节性劳工移民,主要从事渔业和珍珠打捞、加工等传统行业。20世纪50年代,尤其是60年代以来,海湾国家的石油工业迅猛发展,由此开始大规模引入劳工移民。到1972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中文简称欧佩克)国家大约有80万外来劳工移民。石油危机之后,石油价格暴涨,“石油美元”使得海湾国家“财大气粗”,道路、港口、学校等基础设施的大举兴建进一步扩大了劳工移民的引入规模。到1975年,海湾国家的外国人口已经多达380万,占这些国家总人口的40%。按照海湾国家外来劳工移民的特征,大致可以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湾国家外来移民的情况划分为三个阶段:

1.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早期。这一时期,海湾国家竞相争取来自美国、欧洲、周边阿拉伯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劳工移民。从1975年到1980年,劳工移民数目增长了整整一倍,

参见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Seventh European Regional Meeting*, Budapest, 14 - 18 February 2005.

本文所说的“海湾国家”指海湾合作委员会(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各成员国,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本文主要涉及到劳工移民、非法劳工移民和难民,其中难民属于强制移民这一类别,并且难民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最终演化为通常意义上的移民或劳工移民。关于难民的去向问题,可参见肖宛:《阿富汗的难民问题》,载《西亚非洲》,2002年第2期,第10—13页。关于劳工移民的界定,可参见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Labour Migration to the UK*, 15 June 2004, p. 2.

参见 M. Abell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Patterns and Implications for Sending Countries”, in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gional Processes and Responses*, New York and Geneva, 1994, p. 164.

同上,第165页。

达到海湾国家总人口的 33%。当时,海湾国家所急需的高技术和管理人员主要来自欧、美等国家,而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则主要依赖来自埃及、巴勒斯坦和也门的阿拉伯裔劳工移民。

2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到 90年代中期。80年代中期,由于欧佩克国家内部分歧、非欧佩克国家石油产量增加,石油价格开始下滑甚至暴跌,各石油生产国公、私企业为削减开支,开始使用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非熟练工人,以替代薪资要求较高的阿拉伯裔熟练工人。而在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有着人数众多的非阿拉伯裔穆斯林人口,足以填补阿拉伯裔劳工移民所遗留的空缺。此外,1990年的海湾危机和随后的海湾战争也对海湾国家劳工移民的来源和构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也门、约旦、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由于“站错队”而招致沙特、阿联酋等国家的抵制,来自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大量劳工移民沦为阿拉伯国家之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总计有 200万阿拉伯裔劳工移民失去了他们在海湾国家的职位。

3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影响这一时期劳工移民特征的主要因素包括:油价波动、外国投资萎缩、本国就业人口增加、海湾战争造成的“余震”和美伊战争引发的“地震”等。到 1997年,海湾六国总人口达到 2789.5万,是 1950年的 6倍。每年进入就业市场的青年占这些国家总人口的相当大比例,由此形成巨大的就业压力。而私营企业往往不愿意雇用本国工人,因为他们技术水平低且工资期望值高;国营企业愿意吸纳本国工人,但不得不得解雇外来劳工移民以降低成本。美伊战争对于外来劳工移民的来源和构成的影响远远超过海湾战争,伊拉克人和那些来自支持伊拉克的国家(如巴勒斯坦、约旦、也门和苏丹)的劳工移民被迫离开海湾国家。据估计,这些劳工移民的人数多达 150万以上。尽管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劳工移民减少了,但是海湾国家劳工移民的数目仍然相当庞大,总计达到 1250万,将近占海湾国家总人口的 40%(详见表 1),而且还不包括数目巨大的非法劳工移民。

(二)原因

推动海湾国家劳工移民持续增长的原因很多。从海湾国家内部来看,外来劳工移民剧增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石油工业的迅猛发展需要大批的熟练技术人员和中、高级管理人员,而海湾国家人口的教育、文化和技术水平普遍较低,往往无法达到实际工作的技能和素质要求。以沙特为例,1950年其石油日产量为 54.7万桶,到 1974年产量达到 848.3万桶。技术的进步固然是沙特石油日产量迅速增加的重要因素,但其中也凝结着众多管理人员、技术工人和普通劳动者的心血。(2)人口总量较小,劳动力缺乏较为普遍和严重。1950年,海湾六

表 1 2002年海湾国家劳工移民情况(单位:千人)

国家	外来劳工移民数目	劳工移民占总人口比例(%)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488	80
卡塔尔	420	80
科威特	1475	65
巴林	280	40
沙特阿拉伯	7000	30
阿曼	630	26

资料来源:参见 Andrzej Kapiszewski, "Arab Labour Migration to the Gul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Arab Migr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 p. 117.

参见 M. Girgis, *Would Nationals and Asians Replace Arab Workers in the Gulf?*, Amman, Jordan, 2002, p. 43.

参见吴磊:《中国石油安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 16—18页。

参见 P. Fergany: "Arab Migration to Europe: Trends and Policie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Arab Migr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 Geneva, 2004, pp. 135 - 153.

参见陈建民编著:《当代中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 198页。

参见 Andrzej Kapiszewski, "Arab Labour Migration to the Gul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Arab Migr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 Geneva, 2004, p. 117.

参见陈建民编著:《当代中东》,第 205页。

国总人口为 466 9 万;到 1974 年,这一数字增长到 962 4 万;到 2004 年,这一数字进一步增长到 2118 43 万,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2004 年,海湾国家全部劳动力中将近 70% 是劳工移民,其中,科威特的这一比例为 82%,卡塔尔接近 90%,阿联酋更是高达 90%! (3) 适龄劳动力人口尤其是女性的就业率偏低。2000 年,卡塔尔和阿联酋妇女的就业率仅为 15%,沙特、阿曼、巴林和科威特四国分别为 16%、17%、21% 和 31%。(4) 适龄劳动力人口倾向于在工资、福利待遇较好的国营单位就业;由于国民的社会福利待遇好,非劳动收入较为丰厚,因此,一些人不愿进入劳动力市场,宁可依赖国家的补贴度日,等等。此类因素导致私营企业劳动力极为缺乏。(5) 军队的迅速扩充也夺走了相当大一部分青壮年劳动力。1985 年,海湾六国军队总人数为 12 88 万人,到 1997 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 30 86 万人,几乎增长了两倍。从海湾国家的外部因素来看,大部分亚洲国家是人口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在一定程度上,迅速膨胀的人口是它们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出口“失业”、增加外汇收入、提高国民素质等因素推动许多亚洲国家,尤其是不产石油的阿拉伯国家、南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向海湾国家输出大量剩余的廉价劳动力。

(三) 特点

1. “临时性”劳工移民的“永久化”。劳工移民在海湾国家的合同期一般为 5 年左右,故具有明显的“临时性”。许多劳工移民输出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战略,期望从本国输出的大量劳工移民在合同期满后返回国内,带回可观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从而大力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然而事与愿违,“没有比临时移民更为永久的了”。许多劳工移民选择出国打工不是作为一种暂时的获取资金、技术和经验的途径,而是作为一种提升自身社会地位和增加家庭收入的手段,一个尚未到退休年龄就归国的劳工移民会被视为失败者。这样,“临时性”劳工移民相应地变成“永久性”劳工移民,劳工移民输出国的发展战略就落空了。

2 劳工移民的来源由过去以阿拉伯国家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南亚、东南亚国家为主。2002 年,来自海湾地区以外的阿拉伯裔劳工移民总数大约为 350 万,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劳工移民大约为 750 万;外来劳工移民中阿拉伯裔的比例从 1975 年的 72% 急剧下降到 25%—29%。关于海湾国家外来劳工移民的构成,详见表 2。

3 近年来,海湾国家的外来劳工移民中女性明显增多,出现了女性化的倾向。这些女性劳工移民主要由两部分组成:来自斯里兰卡、菲律宾和孟加拉国的大量女佣;来自原苏联国家的大量中、青年女性,她们中有些人是通过人口贩卖或被诱骗而来,多半从事卖淫等非法活动。

参见陈建民编著:《当代中东》,第 198 页。

参见 Andrzej Kapiszewski, *Arab versus Asian Migrant Workers in the GCC Countries*, Populatio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New York, 22 May 2006, p. 4.

参见 Andrzej Kapiszewski, *Arab versus Asian Migrant Workers in the GCC Countries*, p. 4.

参见 *Newsletter of the Economic Research Forum, for the Arab Countries, Iran & Turkey*, vol 10, No 1, Spring 2003, p. 27.

参见 Roger Ower, *State,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Routledge Press, New York, 2000, p. 211.

David Elleman, “Labour Migration: A Developmental Path or a Low-level Trap?”,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vol 15, No 5, August 2005, p. 618.

参见 Andrzej Kapiszewski, “Arab Labour Migration to the Gul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Arab Migr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 Geneva, 2004, pp. 121 - 123.

参见 D. McMurray, “Recent Trends in Middle Eastern Migration”, in *Middle East Report 211*, 1999, pp. 16 - 19; H. Jaber, F. Metral & M. Dorai, “Migration in the Arab Middle East: Policies, Networks and Communiti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in *Research Programme, CERMOOC*, Beirut/Amman, Konrad Adenauer Foundation, 2000, p. 9.

女性所占比例较高的劳工移民输出国家主要有印尼、菲律宾和斯里兰卡,详见表 3。截至 2001 年,海湾六国共有来自上述三国的女性劳工移民 549838 人。

表 2 海湾国家外来劳工移民的主要来源构成 (单位:千人)

输入国 \ 输出国	巴林 2004年	科威特 2003年	阿曼 2004年	卡塔尔 2002年	沙特 2004年	阿联酋 2002年	合计
印度	120	320	330	100	1300	1200	3370
巴基斯坦	50	100	70	100	900	450	1670
埃及	30	260	30	35	900	140	1395
也门					800	60	860
孟加拉		170	110		400	100	780
菲律宾	25	70		50	500	120	745
斯里兰卡		170	30	35	350	160	745
约旦/巴勒斯坦	20	50		50	260	110	490
苏丹					250	30	280
印尼		9			250		259
伊朗	30	80		60		40	210
叙利亚		100			100		200
科威特					120		120
土耳其					80		80
尼泊尔				70			70

资料来源:参见 Andrzej Kapiszewski, Arab versus Asian Migrant Workers in the GCC Countries, p 10.

表 3 海湾国家女性劳工移民的数量及在来源国劳工移民中所占的比例

输出国 \ 输入国	印尼		斯里兰卡		菲律宾	
	女性劳工 移民数量	所占比例 (%)	女性劳工 移民数量	所占比例 (%)	女性劳工 移民数目	所占比例 (%)
沙特	295038	92	183800	57	71000	27
阿联酋			94500	72	1900	44
科威特			137700	85	24000	75
阿曼			28400	79	3000	/
卡塔尔			11000	19	5000	71
巴林			21000	78	3000	60

资料来源:参见 S. Esim & M. Smith, Gender and Migration in Arab States: The Case of Domestic Workers Beirut, Regional Office for Arab States, LO, 2004, p 13.

4. 由于海湾各国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不一、国家之间关系的差异等因素,外来劳工移民在不同海湾国家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差很大。例如,以来自埃及的劳工移民为主体的阿拉伯裔劳工移民占沙特总人口的 37%,占科威特总人口的 34%,占阿联酋总人口的 11%,而在阿曼和巴林,阿拉伯裔劳工移民所占比例很低。

参见 S. Esim & M. Smith, Gender and Migration in Arab States: The Case of Domestic Workers, p. 13.

参见 Andrzej Kapiszewski, "Arab Labour Migration to the Gul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Arab Migration in a Globalized World, pp. 124 - 125.

二、外来劳工移民对海湾国家的影响

(一)经济方面

近半个世纪以来,劳工移民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竞相争夺的一种宝贵资源,来自发展中国家数量巨大的劳工移民以他们的勤劳和智慧为这些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世界银行发布的《2006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移民可以使全球实际收入提高0.6%,即3560亿美元。海湾国家的情况虽然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但是,海湾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石油工业的腾飞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财富,主要就是外来劳工移民的贡献。以石油王国沙特为例,1970年以后,随着石油资源的逐步收回,石油收入逐年增长,由1971年的21.49亿美元剧增到1981年的1161.83亿美元,沙特由一个资金短缺的国家变成了“超级金融大国”,从而为其民族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对于劳工移民输出国来说,劳工移民的经济影响力也是显而易见的。在1992年到2001年的10年间,平均每年从沙特、科威特、阿曼寄出的汇款分别达到154亿、14亿、14亿美元!沙特是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移民汇款寄出国,科威特和阿曼分别位居第九和第十。同期,印度、菲律宾、埃及收到的移民汇款平均每年分别达到77亿、50亿、38亿美元,印度雄踞全球移民汇款接收国榜首,菲律宾和埃及分别居第四和第七。“移民汇款是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第二大资金来源。估计全球10%的人口在寄送或者接收汇款。”每年从海湾国家流出的汇款平均达到270亿美元左右,此外,还有数目不详但肯定是不可小觑的资金通过非正式渠道流到世界各地。对于普遍缺乏资金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数额巨大、较为稳定的劳工移民汇款是它们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动力。

(二)政治方面

劳工移民对输入国和输出国的政治影响因输入国和输出国的不同而差异很大,但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劳工移民的大量存在,使其成为海湾国家制订对外政策时所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没有任何正式的政治权力,但劳工移民往往通过当地媒体的报道来发挥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少数得以进入所在国重要权力机构的移民,则充分利用他们与上层政治人物的关系施加影响。“尽管劳工移民没有公民身份,但他们比当地大部分公民更能施加实际政治影响。”同时,输出国与输入国的关系对劳工移民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1996年,卡塔尔发生未遂政变,埃及涉嫌参与了谋划,卡塔尔政府以此为由驱逐了大约700名来自埃及的劳工,其中许多人此前受雇于卡塔尔内政部;1999年10月,科威特发生骚乱,数百名来自埃及的劳工参与其中,科威特军警以纵火、非法集会、拒捕为由逮捕了16名埃及人,埃及外交部门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两国关系一度紧张;1999年11月,由于沙特与也门的边界争端升级,大约3000名也门人被驱逐出境,等等。沙特、科威特、巴林等国的内部安全和稳定也因劳工移民的罢工、

参见 The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2006: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Remittances and Migration*, 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2005, p. 31.

参见陈建民编著:《当代中东》,第205页。

参见 Devesh Kapur, “Remittances: The New Development Mantra?”, in UNCTAD NATIONAL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G - 24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No. 29, April 2004, p. 6.

参见 UNDP, *The Potential Role of Remittances in Achieving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 An Exploration*,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0 October 2005, p. 2.

参见 Andrzej Kapiszewski, *Arab versus Asian Migrant Workers in the GCC Countries*, p. 10.

参见 Hassan Hamdan Al-Alkim, *The GCC States in an Unstable World: Foreign Policy Dilemmas of Small States*, Saqi Books, London, 1994, p. 49.

骚乱而受到影响。可见,劳工移民要么因其“失当”举措而导致输出国和输入国关系紧张,要么沦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此外,不同时期、不同来源构成的劳工移民对海湾国家发挥着不同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大量巴勒斯坦裔劳工移民的存在及对巴民族解放事业的认同,使得海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来自南亚、东南亚的劳工移民日益增多,这一非阿拉伯裔群体中的许多人并不信仰伊斯兰教,他们的世俗观念和政治观念对所在国的其他人群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阿拉伯裔劳工移民中“左翼”的泛阿拉伯主义观念则对海湾国家的君主体制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例如,许多阿拉伯裔劳工移民认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边界是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后果,应该把它们从地图上抹去;还有人认为,阿拉伯人应该在阿拉伯国家之间自由流动;更有阿拉伯人认为,石油是真主赐予全体阿拉伯人的财富,故“石油美元”应该由全体阿拉伯人共同分享。

(三) 社会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输出国而言,劳工移民的涌现及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存在和日益增多,为缓和本国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及时、有效的“安全阀”。在掌控国家政权之后,昔日的社会精英往往运用手中的权力巩固其自身的优势地位,反对任何可能危及其自身利益的激进的社会改革。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往往陷入滞胀,随之而来的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社会动荡。大量“野心勃勃”或有着较高知识和技能的社会精英因此远赴他国谋生,这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缓解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客观作用,尽管他们的行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事实上,劳工移民的涌现为这些国家“出口”了失业问题,同时又缓解了调整经济、社会结构以促进发展所面临的紧迫压力,移民汇款更是为一些国家脆弱的经济及时注入了“强心剂”。从海湾国家的角度来看,国际石油市场的价格波动、本地区国家石油政策的分歧以及近年来非欧佩克国家(海湾国家中只有巴林和阿曼未加入欧佩克)石油产量的大幅增长,无不对海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并由此波及数量巨大的外来劳工移民。以沙特为例,整个20世纪90年代,由于石油价格低迷,沙特政府被迫压缩能源投资计划,削减社会福利开支,降低防务费用。对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的不满连同对美国军事存在的憎恨,可能导致广泛的反政府行为,社会问题由此日益突出。在什叶派聚居地区,宗教上的少数派什叶派和劳工移民“惺惺相惜,患难与共”,罢工、骚乱、破坏石油设施等内乱频繁发生。

(四) 其他方面

劳工移民给输入国带来的不仅仅是优秀的人才、熟练的劳动力等有利因素,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挑战甚至负面影响。“对于输入国来说,雇用外国工人既有利可图又代价昂贵。”例如,输入国必须处理劳工移民的住房、就业、职业技术培训、子女教育、交通以及医疗等问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大量熟练工人和科技人员的外移导致不少国家人才流失严重。典型的移民并非穷人中的穷人,更多的是熟练工人和具有良好素质的脑力劳动者,一些国家竟然有高

参见 Andrzej Kapiszewski, *Arab versus Asian Migrant Workers in the GCC Countries*, p. 6.

参见 David Elleman, “Labour Migration: A Developmental Path or a Low-level Trap?”, in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vol 15, No 5, p. 620.

参见吴磊:《中国石油安全》,第156页。

Andrzej Kapiszewski, *Arab versus Asian Migrant Workers in the GCC Countries*, p. 10.

参见 David Elleman, “Labour Migration: A Developmental Path or a Low-level Trap?”, in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vol 15, No 5, p. 619.

达 30% 以上的大学毕业生赴海外务劳！因此，有学者提出了所谓的“循环移民”（circular migration）的主张，即移民输出国家通过使用其海外移民的科技成果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人才流失所带来的损失，同时又不必迫使这些移民回国；还有一些学者（包括我国的个别学者）和国际组织主张实行双重国籍来应对人才流失问题，但这一办法涉及到移民输出国、输入国以及移民本人等诸多主体，以及签证体制、合作机制、学费标准、税收、投资和 인권问题等诸多因素，实施起来难度很大。

三、海湾国家外来劳工移民的处境和前景

尽管外来劳工移民为海湾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就目前而言，海湾国家外来劳工移民的处境不容乐观。首先，他们几乎都是临时劳工移民（合同期一般不超过 7 年），一纸劳动合同排除了他们成为输入国公民的可能性，而公民身份的缺失，从根本上导致劳工移民的基本权利无法得到保障。2005 年，在科威特、巴林和卡塔尔等国先后爆发了游行示威，劳工移民的工资拖欠问题再一次浮出水面；2006 年 3 月，由于恶劣的工作环境、低工资和拖欠工资等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在迪拜从事建筑业的数百名南亚劳工移民举行罢工，后演变为骚乱。其次，劳工移民通常与“3D”——肮脏（dirty）、危险（dangerous）以及不体面（degrading）——工作有着密切联系，这些工作是本国劳动力不愿意甚至拒绝从事的。例如，科威特 90% 以上的本国劳动力集中在工资、福利待遇丰厚的国有部门，而在该国的 110 万劳工移民则很少有机会进入这些部门，除非是某些技术水平要求特别高的工作岗位。这显然侵犯了劳工移民的劳动权，并且严重违反了国际劳工组织（LO）在 1958 年通过的针对就业与职业歧视的公约。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动标准，劳动权是指劳动作为权利是自由的，同时，劳动者参加劳动的机会也是平等的，所有劳动者应在平等的基础上竞争。国际劳工移民组织也对就业与职业歧视做出了明确界定：歧视是指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见、民族血统、社会出身等原因而实行的具有取消或损害就业的职业方面的机会和待遇平等作用的任何差别、排斥或优惠；这种歧视既可以是由法律规定的结果，也可以是惯例所形成的。最后，尽管劳工移民通常从事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工作，拿着最微薄的薪水，但他们还是受到来自政府、雇主、工友和其他人的歧视。输入国的人通常认为外来劳工移民在关键时刻对“祖国”不忠诚，是潜在的政治危险势力，甚至认为他们为外国势力充当“第五纵队”。例如，2005 年 8 月，科

参见 P. Wickramasekara, “Policy Responses to Skilled Migration: Retention, Return and Circulation”, in Paper 5E, *Perspectives on Labour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rogramme, Geneva, LO, 2002, p. 5.

参见 UNDP,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2*,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2002; UNDP, *Arab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3*,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2003; World Bank, *Unlocking the Employment Potential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4; N. N. Sorensen, “The Development Dimension of Migrant Remittances”, in *Migration Policy Research*, DM Working Paper 1, June 2004; N. N. Sorensen, “Migrant Remittances as a Development Tool: The Case of Morocco”, in *Migration Policy Research*, DM Working Paper 2.

关于“3D”工作还有其他说法，如肮脏（dirty）、危险（dangerous）以及艰苦（difficult）的工作。

参见 Ray Jureidini, “Migrant Workers and Xenophobia in the Middle East”, in *Identities, Conflict and Cohesion Programme*, Paper Number 2,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December 2003, p. 4.

参见 The Office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HCHR), *Discrimination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 Convention*, 1958 (No 111), 载 <http://www2.ohchr.org/english/law/employment.htm>.

参见 Andrew Whitley, “Minorities and the Stateless in Persian Gulf Politics”, in *Survival*, vol 35, No 4, 1993, p. 30.

沙特内政部以保障国家安全为由,禁止来自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的劳工入境。2005年11月,海湾合作委员会秘书长语出惊人:“外籍工人问题是安全问题!”又如,女性劳工移民一般从事家政工作,常常受到雇主的暴力、性、心理等方面的虐待。有学者认为,这些女性劳工移民的法律、管理和工作状况符合巴利所说的“合同奴隶制”(Contract Slavery)概念,并且,这种情况在中东国家中相当普遍。

关于海湾国家外来劳工移民的前景,笔者认为,左右海湾国家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因素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本地区就业人口;劳动力市场“民族化”(nationalization,或译“国民化”)的进程及效应;地区经济创造新就业机会的多寡;本地区劳动力人口从事“3D”工作的比例,等等。从1995年到2004年,海湾国家的外来劳工移民从700万增加到1250万。预计在未来10年中,海湾国家的劳工移民还会增加大约1000万。随之而来的是,外来劳工移民在一些海湾国家总人口中的比例还会进一步攀升。由于南亚和东南亚劳工的薪资要求较低,未来他们仍将得到海湾国家企业主尤其是外国投资者的青睐,并持续构成这些国家劳工移民的主体。

然而,不容乐观的地区局势为海湾国家外来劳工移民的前景抹上了浓重的阴影。自1990年以来,地区局势动荡、石油价格波动、恐怖主义活动泛滥和人口增长迅速等因素,导致中东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就业率普遍下滑,人口压力增大。这些国家由此而面临着较大的内、外压力,纷纷减缓外来劳工移民的引进,实施劳动力“民族化”计划,提高国民就业率尤其是妇女的就业率。1998年,巴林率先实施限制外来劳工移民入境和提高本国国民就业率等措施,阿曼、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随后效尤。2003年2月初,劳工移民接收大国沙特宣布,到2013年将外来劳工移民及其家属减少到占沙特总人口的20%以下,这就意味着将有大约300万外来劳工移民被迫离开沙特。2005年3月,沙特劳工部长宣布,本年度颁发的劳工签证由上年度的832244份减少到684201份。这些举措都将严重影响海湾国家外来劳工移民的前景。

(刘军,讲师,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昆明,650091)

责任编辑:刘真]

参见 *Amb Times*, 29 August, 2005.

Gulf News, 24 November, 2005.

巴利认为“合同奴隶制”由三个因素构成:暴力或暴力威胁、人身活动的限制、经济剥削。参见 Ray Jureidini, “Migrant Workers and Xenophobia in the Middle East”, in *Identities, Conflict and Cohesion Programme*, Paper Number 2, p. 6.

参见 Andrzej Kapiszewski, *Arab versus Asian Migrant Workers in the GCC Countries*, p. 13.

参见 World Bank, *Unlocking the Employment Potential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p. 159 - 160.

参见 D. Pakkiasamy, “Saudi Arabia’s Plan for Changing its Workforce”, in *Migration Information Source*, November 1, 2004, 载 <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

参见 *Amb News*, 26 March, 2005.